

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

发展经济学的 基本问题

開発経済学の
基本問題

经济科学出版社

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日] 石川滋 著
胡欣欣 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152 号

0700

石川滋 著
开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本书根据日本岩波书店 1990 年版翻译

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日〕石川滋著 胡欣欣等译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地质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5 印张 290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册

ISBN 7-5058-0566-5/F·457 定价：5.90 元

《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序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取得了民族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在经济上却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难和问题，例如，人民生活贫困、人口压力沉重、严重的失业或就业不足、人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低下、技术力量奇缺、劳动生产率低、产业结构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没有工业或工业化程度极低、资金短缺、城乡差别巨大、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严酷的不利地位，等等。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解决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使经济发展起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各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各种不同的道路，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颇不相同，甚至差异极大，其中有不少值得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各国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展经济的理论，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种种学派。由于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各种学派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其中又以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的理论占主导地位。在西方国家、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有少数经济学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人们称之为激进主义的理论，但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不同以及对问题的见解不同，他们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不相同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些国家（例如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也要解决种种困难和问题，以使经济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经济理论，但是系统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还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在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学家都简单地把西方国家的发展经济学视为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异端邪说，而一概加以排斥，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完全脱离，对于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也一概排斥，不去研究，甚至不承认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不仅障碍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也使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实际上，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不同于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但在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与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尤其是大国）相同的或相似的。为了使我国的经济更顺利地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而且也需要研究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这样，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因此，近年来，在我国，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发展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设立了一些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机构和组织，在许多大学开设了发展经济学的课程。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众多，不仅限于经济本身的各种因素，而且包括其他许多非经济的因素，例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人口状况、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幅员大小等等。

即使在同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下，实行不同的具体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也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最近十多年，我到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过那里的经济发展问题，也研究过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深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异常复杂（参见拙著《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在作了这些实地考察和研究以后，再读西方各派的发展经济学著作，我感到除了少数著作中的一些理论已被实践所推翻以外，许多发展经济学著作中的理论，虽然大都从某一个侧面抓住经济发展的问题加以研究，但他们对这一侧面的论述往往是颇为深刻的。这些不同学派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又往往试图就某一个侧面，从某一种理论模型和框架出发，去建立一套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概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或者把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所应着重解决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应采取的某种措施视作为适用于经济发展一切阶段的问题和措施。这就使得不少发展经济学著作的理论有以偏概全的缺陷，而且彼此之间争论激烈。其实，发展经济学的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只要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注意到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中过分突出某一侧面并忽视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仍能从这些理论中吸收有益的成份。

八十年代以来，对发展经济学的兴衰、存亡问题却产生了悲观的论调，有人甚至宣称：“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很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同时兴旺”（D·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83年英文版，第109页）。这种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发展经济学还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未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众多复杂的经济发展问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旧贫困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一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确实被实践所否定。但总的说来，发展经济学对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其理论也在发展和完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与发达国

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有用的，但毕竟不能回答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特殊问题。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的不同学派的争论，在以往由于实践的发展尚不够充分，难以作出谁是谁非，或者在什么情况下谁是，在什么情况下谁非的结论的话，那末，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多年的发展，由于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采取的经济政策不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差别极大。这就使得在发展经济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关于强调政府、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是强调发挥民间的主动性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于强调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还是强调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关于实行进口替代还是实行出口鼓励，关于平衡增长还是不平衡增长，等等，有了较为接近的看法。只要认真研究四十多年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其提供的经验教训，发展经济学不仅不会衰落、死亡，而且还会进一步发展。

为了适应学习和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需要，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教训，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我们决定编辑出版《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丛书》主要是译自各种不同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著作，供国内参考。我们也希望陆续编辑出版我国经济学家写作的发展经济学著作，论述我国经济的发展或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自从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特别是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我国改革以来发展经济的成就和经验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赞赏，如果对我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问题作认真研究，并参考和吸收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的有益成份，我们就一定能创建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希望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起一些作用。

这些《丛书》自陆续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第一

次印刷早已售完，又印刷了一次。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一些新书。

董辅初

1987年3月，1993年元月修改

中文版前言

我的论文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我感到非常光荣，也感到十分高兴。而更为荣幸的是，翻译出版本书的最初建议，是由董辅初和陶文达这两位教授几乎在同时提出的。

董教授的建议，是要将本书作为他任经济科学出版社社长时主编并延续出版至今的“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中的一卷，与该丛书其他著作同样，用来满足学习、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需要。因为发展经济学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而陶教授建议翻译出版本书，是要将本书作为他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主编的“全国高等院校财经专业核心课程”中的教科书《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外国参考书。所谓“全国高等院校财经专业核心课程”，是在我本人作为外国专家咨询组成员参加组织的“世界银行贷款第二个大学发展项目”的“财经专业教学计划国际研讨会”（1987年8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上，由中外经济学者共同向国家教委建议的。国家教委接受了这一建议。陶教授所编著的《发展经济学》一书，是继在此之前制定的《发展经济学教学大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之后，实施这一建议的重要步骤。

本书是一部论文集。作为其主题的发展经济学，正如《发展经济学教学大纲》中所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对于其对象、方法、规范等，还没有形成定论。特别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发展经济学现在是首次正式编入经济学教学课程。因此，在中文版前言中，有必要就作者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立场、方法，特别是从这种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经

济的方法事先做出明确的说明。在此，我想参照《发展经济学教学大纲》的表述，阐述以下三点。

(1)“教学大纲”提出，发展经济学是要对各种发展理论与战略、经济战略与可能实施的对策进行比较和探讨，研究欠发达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教学大纲”对“欠发达”的内容进一步作了两点解释：首先，“欠发达”指生产力的落后和市场经济的欠发达；第二，这种“欠发达”指的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欠发达”，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原始积累”阶段）的“欠发达”。我本人也大体同意上述对发展经济学对象的把握与方法。

现再就译法问题作一下说明。中国所说的“发展经济学”，是由“development economics”一词翻译而来的。在日本，有时也使用与中国同样的译法，但特别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为对象时，一般译为“开发经济学”。我想中国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是由“developing countries”翻译而来的。它在日本被译为“开发途上国”。被译为“不发达”（或“欠发达”）一词的原文，我想恐怕是“underdevelopment”。这在日本被译为“低发达”。此外，中国所说的“商品经济”，按我们更为一般的称呼为“市场经济”。

在此再作一点补充。我认为，为了对现代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效分析，在不损害分析的统一性的前提下，无论哪个学派创造的概念和用语，都可以加以灵活运用。对于发展经济学的重点研究目的，我本人考虑进一步将其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a) 阐明市场经济欠发达状态的机制，及其过渡到发达状态的过程；(b) 着眼于揭示各个发展中国家因自然资源秉赋等初始条件的差异所显示的发展过程的不同形态，建立一些特定初始条件的特定发展模型；(c) 将利害关系各异的各种社会经济势力的联合与对抗关系作为生产力及市场经济等制度的发展创造最重要契机的因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日文版序论所述，在本书中，将把其中 (a)、(b) 作为发展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进行研究。

(2)“教学大纲”强调，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我想谈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本书所采取的立场是：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迅速实现经济独立而采取的“统制主义”体制的一个变种。所谓“统制主义”，指国家运用以下三种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加以控制：(a)将被认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作为国营部门加以直接控制；(b)被认为其次重要的经济活动由民间部门负责，而国家则通过许可、认可制及其他手段对此进行控制；(c)制定国民经济计划。通过其中(a)和(b)，可以控制国家干预的方向。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最为综合而强力地行使这些手段、特别是其中(a)和(c)项手段的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其中之一。然而，不能否认，即使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城市与农村生产与人民生活的相当广泛的领域中，也残留着这些政策手段的效力所涉及不到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很多初级产品出口国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市场经济以产品市场为中心已相当发达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试图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时，统制主义的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渗透到其政策实施过程中。

第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经济内容之一的生产力的落后性，已经有很多人从理论上、经验上加以解释，我们对此的知识相对来讲也比较丰富。但对于市场经济的欠发达则并非如此，它成为发展经济学没能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本书中，准备以各种市场及社会分工形成方面的落后性来解释市场经济欠发达这一概念。在这方面更为详细的探讨，有明特从“流通费用”及“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的说明，以及最近斯蒂格利茨从“不完全信息理论”的角度所作的解释。但更为重要的是，由市场经济的欠发达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功能的低效，往往能够通过村落共同体等“传统经济”的配置机能来加以弥补。本书所要揭示的正是，“传统经济”的机能中虽然存在着落后、消极的方面，但它也有一

些积极的侧面,如可以保证共同体成员最低限度的收入和就业,并使治水和灌溉设施、改良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普及等“集合性物品”的供给成为可能。

第三,虽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统制主义”通过抚养迅速增加的人口、建立或大或小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而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其目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最近又出现了很多副作用。似乎可以说,由此产生的低效与对增长的阻碍,已经发展到了不能放任不管的程度。80年代初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持续性国际收支困难与债务累积危机。以此为契机,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改革统制主义体制、引入市场经济的配置效率和活力的动向。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提出的政策被称为“结构调整”。

从这种“结构调整政策”在总体上以市场经济导向为目的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妥当的。然而,具体地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是按照并不一定符合各国经济实际情况的相当整齐划一的处方仓促实施的。所以在一些国家中,结构调整没有获得成功。本书说明了很多这样的事例。本书指出,不成功案例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政策是以新古典学派的观点来理解问题的,将发展中国家最近出现的经济危机归于由政府过度干预所导致的市场价格的“扭曲”(distortion)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配置低效和增长阻碍。然而,即使消除了这种“扭曲”,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自动正常运行。这是由于,(a)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市场经济的框架本来尚未完全形成。因此,即使消除了由统制主义的政府干预所产生的经济的“人为的后天性扭曲”(artificial distortion),由市场经济的欠发达所导致的“先天性扭曲”(natural distortion)也将继续存在。(b)此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背后存在“传统经济”的分配机能时,仅靠消除“人为的扭曲”更不会对其产生太大影响。在这种局面下,统一地、并且

仓促地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方案，甚至有可能招致惨痛失败。

第四，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问题，可以作为由这种统制主义“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普遍性问题的一个变形来把握。我们之所以可以将中国的问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由于中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保持着在研究、制定政策方面的紧密联系。然而，这有时反而会使中国经历一种过渡时期的特殊困难。在1988年以前的一段时期中，由于过度的乐观主义，使社会主义制度与激励政策的自由化遇到困难便是一例（见本书第七章）。90年代的改革，尽管速度较慢，但似乎进行得更为稳妥。1991年中期以来，粮食、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改革出现了进展。这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步骤。同样，作为国营企业改革的前提，中国正在尝试改革目前以企业为单位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由国家、企业、职工共同负担、由国家专管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3)“教学大纲”指出，现代发展中国家虽具有共同的特性，但其具体情况却有很大差异，为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必须根据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加以科学分类。我对此也表示赞成。我在(1)的(b)中之所以提出要建立“特定初始条件的特定发展模式”，正是由于我肯定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的必要性。

关于这种特定发展模式，下面再作几点补充。

第一，我开始强调特定发展模式的重要性，是在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以后。即：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越是靠近发展初期，自然资源禀赋（在劳动与资本方面）的差异便越可以使各国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差异。而像目前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省那样进入发展后期以后，虽然仍存在着自然条件的差异，但由于资本积累的进展，初始条件的差异会丧失其重要性，从而趋于形成同

样的发展模式。在发展模型方面，本书列举了若干现有的模型。其中农、工业二元经济型发展模式（刘易斯模型）与出口初级产品的专业化型发展模式（明特模型）对亚洲各国最为适用。前者适用于自然资源贫乏、特别是几乎已无可垦耕地而又存在剩余劳动的国家；而后者则适用于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特定发展模式方面，还有一些国家目前无法用现有模型进行分析，为了对这些国家进行分析，我们应该建立新的模型。此外，对于那些可以套用现有发展模型的国家，也必须根据其经济发展进程对原有发展模式加以扩大和补充。

第二，哈罗德-多马模型等新凯恩斯学派的增长理论，以及索洛建立的新古典学派的增长理论，是研究走向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稳态增长的机制，无法以此来说明某些生产要素处于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初期发展过程）。

第三，本书在分析特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和问题时，由于利用了上述模型而受益非浅。对于中国本来的发展模式，人们认为，刘易斯的模型具有很强的说明力，从而常常利用这一模型（我之所以说是“本来的发展模式”，是由于它与现实的发展过程重叠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计划模式的影响）。不过，中国的实际发展过程，似乎比我在本书中所叙述的还要迅速一些。

关于刘易斯模型，还要特别指出以下几点：(a) 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60年代引进了矮秆高产籼米品种，90年代中期以后引进了一代杂交品种。通过这种增产革命（即所谓“绿色革命”）和灌溉、施肥的加强，以及80年代以后由集体农业生产转为个体生产所产生的激励效应，其综合作用使中国解决了在刘易斯模型里不断可能成为瓶颈的“自给性农业部门”的增产问题。其结果，使农业部门提供到非农业部门的粮食商品化率由60年代、70年代的20%以上提高到80年代后期的将近35%。(b) 随着农业的增产，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显著提高。特别是从居民消费的粮食恩格尔系数来看，已由1978年的44.2%（农村）和

22.4%（城市）下降到了18.4%和6.6%。(c) 出口总额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50%上升到1988年的70%以上。中国虽然依然持续着大量的粮食净进口，但这毋宁说是由于在此中体现的向具有比较利益产业的转移所致，可以说它越来越不是以往粮食问题的反映。(d) 从上述情况来看，似乎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脱离（扩大的）刘易斯模型的可能性。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不仅受到了董辅初、陶文达两位教授的照顾，而且还得到了中国很多人士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欣欣、韩铁英、张北、徐昌军以及经济研究所的张荣刚、吴春波等人直接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特别是胡女士对全部译文做了校定，国务院经济体制管理研究所的王冲先生和经济科学出版社的范国鹰先生向胡女士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向他们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石川滋

1992年7月17日

译者说明

本书根据日文版(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译出。
译者分工如下:

序论及第1—3章:张北;第4章:韩铁英;第5章:张荣刚、
吴春波;第6—8章:徐昌军

胡欣欣负责校定全书译稿,翻译中文版前言,并整理了部分
注解,余小华参与了部分校阅工作。王冲协助对中文稿进行了整
理。

感谢本书作者石川滋教授,以及董辅初教授、经济科学出版
社范国鹰先生的大力支持。

译者

序 论

V

这本书是由1964年以后到现在为止我所发表的有关发展经济学论文中选出六篇，再加上未发表的两篇组成的。

书名中所以用“基本问题”字样，只不过想表示本书许多章是我本人为维护发展经济学的存在意义，对最近几年来人们提出的发展经济学对于其源流的现代理论经济学所应具有的独特性，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的有效性的疑问所做的回答。我认为，观察一项研究是否具有发展经济学的独创性，其标准是该项研究的问题是否以恰当地把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基础，而且——这虽然不是绝对的条件——如果发明了理论经济学中所没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并且将其与原有的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同时付诸应用，那么该项研究就更具有了发展经济学的特色。我认为，现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要在发展经济学方面探索其独立的课题领域，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以这种意义上的基本问题为目标，本书研究了两个中心课题，虽然它还不成熟。第一是阐明一般认为是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欠发达”的状态，以及它向发达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此外，经常与上述课题处于表里关系的另一个课题是，与西欧和美国的经验不同，在现代发展中国家中，常有超常地进入发展过程之中、与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并存（补充其低效的资源配置机能）的“村落共同体”等“传统经济”，以及韦伯的概念中的前近代性“财产世袭制”乃至由“专制主义”政府所实行的“国家（命令）经济”等（作为替代的资源配置制度）存在。这个中心课题就是阐明它们的结构与机能以及它们的变化过